



一位在伦敦的日本人乘坐公交车，一户英国家庭在上车后，不停地对其进行辱骂：“你说自己是日本人？骗谁呢！你肯定是中国人！”“你有新冠病毒吧？”“下车啊！”还是英国，印度裔的 Meera Solanki 在伯明翰的一家酒吧里，和朋友们庆祝自己的 29 岁生日，她的好友、中国女生 Mandy Huang 也赶到了。岂料，隔壁桌的一群男人故意找茬，屡屡骚扰，女生们害怕，离开了酒吧，但有个男的一路跟踪，大叫：“带着你的 ×× 新冠病毒，滚回老家！”Meera 试图维护朋友，将该男子推开，此人被激怒，竟对着她的头部就是一记重拳。

最可怕的，是来自亚裔、华人群体内部的敌视。记者的一个前同事，和友人去布拉格的一家中餐馆就餐，才踏进店门，一位华裔阿姨便冷冷道：我们这儿不接待中国人。同事解释：我们是从德国来的，我在德国呆了七年了，朋友也在欧洲待了两周了。本以为阿姨该放心了，谁知，她突然情绪失控，好似留同胞（与病毒压根不沾边）吃顿饭，店内就尸横遍地寸草不生了……

采用隔离的手段，本是为了绝病毒后路；但可惜的是，很多时候，人心经不起推敲考验。

麻风病在欧洲早已消失多年，然而，上个世纪，它在亚洲地区一度颇为猖獗，包括日本和中国。傲慢的欧洲人，觉得“不能克制麻风病的种族是落后的”，需要时刻警惕“他们（亚洲人）再把病给传过来”。这话能忍？！民族自尊心很强的中日两国，遂以国家的强制力量，采取激进手段防控。

为了不给家人添麻烦，日本的麻风病患者常隐居山林，孤独地病死。明治末年，国内仍有 3 万多麻风病患，为了根除“耻辱”，政府于 1907 年制定了《癩预防相关事宜》的法律，强制隐居山林的麻风病患者进入形同监狱的疗养所隔离——麻风病患者，还被强制绝育和堕胎。虽然医学界有识之士多次指出，麻风病不是不治之症，不当采取如此粗暴的措施，但政府置若罔闻，直到 1948 年，还通过了《优生保护法》，以明文将麻风病患者列为绝育对象。至 90 年代，日本多地的麻风病人起诉政府，要求恢复名誉。2019 年，安倍晋三在首相官邸会见了原告团体代表——约 40 名麻风病患者家属，向他们道歉：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给各位宝贵的人生带来沉重的痛苦和苦难，我作为首相，代表政府向大家表达由衷的歉意。”太晚了，日本官方的道歉，毕竟太晚了。

对疫病患者贴上污名标签，进而将之剔除正常的人类社会，最终会自酿恶果，招致肆无忌惮的报复。“把瘟疫过给他们！”仇恨的声音高喊着，互害系统因此触发，汇成黑洞般的深渊。

1601 年，前赴广东履任的王临亨在《粤剑编》中，记载了

广东盛行麻风疫病，而罹患此疾的女性，会假装私奔引诱男性发生关系——这种“过瘾”习俗，源于患者认为将疫病传染至他人，自己或可痊愈，即便此系“无用功”，心内亦感痛快。清初屈大均的《广东新语》，也对类似事件有详细介绍。被社会从肉体到精神“活埋”的病人，就这样完成了覆水不收的恶毒复仇。

人性与科学

今日部分民众对新冠肺炎患者的身心隔离，和 2003 年对 SARS 患者、2001 年对所谓艾滋病患者的“另眼相看”（当年冬天，盛传京津两地有艾滋病患者存心扎针事件），本质上是一模一样的。将病人等同于疫病本身，大刀挥下毫不迟疑，仿佛干脆利落，实则埋下“自宫”之患。

这是谱写于人类元祖基因根部的私利及因私利催生出的虚伪使然。我们心知肚明，病人不过是可怜的、无奈装载病毒的容器，病是病，人是人——但，致命的病毒，残忍地撕裂了温情的面纱，再度蛊惑我们，将人性最深层的劣根本质召唤出来。那份“非我同类（疫者，异也，已非同类），其死无谓”的野蛮，是对难以掌握的可怖事物的“无能为力”的恐慌。H·P·洛夫克拉夫特观望夜空，喃喃“人类最古老、最强烈的情感便是恐惧，而最古老、最强烈的恐惧来源于未知”。苏珊·桑塔格反思得不错，“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”，如何就转换成道德批判，继而转换成政治压迫了呢？萨特则不管“疫不疫，异不异”，一针见血双面精准打击：“他人即地狱”。

感染身体的瘟疫容易结束，毒害心魂的瘟疫照旧蔓延，伺机等待着下一次轮回。靠什么才能克服负面的人性、消弭变态的阻断？共情。或许，语言理解的障碍、地域传播的限制、文化历史的阻隔，轻松裹挟了群体的怒气，拉扯下共情的纽带；但是，依凭与自我乃至超我的对话，依凭思想教育、社会教育、传统知识教育、专业伦理教育等集成的内在精神原则，我们将反省对个体犯下的诛心之过、培养对污名化的抗体、修补防疫不够妥善的漏洞，重新开启共情的仪式，超越桎梏，实践人道主义，塑造彼此理解的命运共同体。

当然，与此同时，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，共情是“本”，科学是“药”。只要疫苗研发出来，病毒自然灰飞烟灭，一切污名、排斥、隔离、禁闭，也将随之不攻而破。那么问题又来了：在尚未制造出彻底攻克病毒的武器之前，我们的确需要暂时的隔